

灵魂的颤动与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时期文学读幽

聂茂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中国新时期文学显示了自己“独质”的特征,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镜相的一部分:既有传统文化、道德、政治的多重负荷,又有外来话语、本土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抑印痕;创作主体的审美走势既有对抗又有认同,既有消解又有重构,既有妥协屈从又有沉默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程序化、模式化和数字化,物质上享受的范畴越宽,精神上的空间却越来越窄。文学艺术作为对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反映,其深层的指归则是精神的核质,是人类的灵魂。基于此,中国作家在输入全球普遍性视野的同时,竭力从事本土性和区域性的建构,既思索“世界文学”可能共有的审美价值尺度,又着力发掘和创造处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与文化个性——这其实是一个更为博大的“民族寓言”。因此,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灵魂的颤动”,如何使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更加深入文学的核质,应该成为每个不甘平庸的中国作家努力思考和自觉行动的艺术追求。

关键词:全球化;新时期文学;灵魂;民族寓言;精神传播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4-0656-04

正在发展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像第三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学一样,显示了自己“独质”的特征:既有传统文化、道德、政治的多重负荷,又有外来话语、本土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抑印痕;创作主体的审美走势既有对抗又有认同,既有消解又有重构,既有妥协屈从又有沉默抵抗。作家人格的复杂性,作品品质的多义性,艺术手法的丰富性,人物形象的飘移性,文本主题的朦胧性,人文倾向的透明性,传播主体的发散性等等,都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具状表征,都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镜相缩影的一部分,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入到百姓日常的生活。

米勒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下,“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新型的、全球化文化的世界范围内,其作用越来越小。”原因是,“由小说提供的文化的功用,正在被电影、通俗音乐以及电子游戏所取代。”这种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的危害在于,“淹没了日渐衰弱的书籍文化平和的声音,同时也淹没了各地民间文化的特征。”^[1]

即是说,全球化语境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程序

化、逻辑化、体制化、器物化、趋同化、模式化和数字化,物质上享受的范畴越宽,精神上的空间却越来越窄。传统意义上人们阅读小说的习惯正逐渐被电影电视电脑所创造的“E-世界”所取代,文学的功能和意义越来越变得无关紧要,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传播精神文明之主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文学艺术变成了边缘事物。

当然,文学艺术并不会消亡,但创作主体应该深刻反省造成文学沦为“边缘事物”的原因。事实上,作为对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反映,文学作品的深层指归是精神的核质,是终极关怀和人类的灵魂。王晓明指出,“二十世纪当代中国小说的最大问题是看不到灵魂,看不到灵魂的痛苦。对二十一世纪的期待,是希望能看见灵魂,能读到灵魂的颤动。”^[2]

因此,如何克服灵魂的缺失、找回灵魂,如何触摸和表现灵魂,如何使作品充满“灵魂的颤动”,如何使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更加深入文学的核质,应该成为每一个不甘平庸的中国作家努力思考和自觉行动的艺术追求。虽然消费主义文化和及时行乐的犬儒主义心态,特别是影视媒体对文学生产场域的侵

占和影响越来越大,但影视媒体在夺走文学“平面注意力”(读纸)的同时,却因文学“立体注意力”(读屏)的大大加强而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中国新时期文坛那些叫得响的作家如莫言、余华、苏童、王朔等没有一个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的热销不与影视的改编有关。可以说,消费主义文化和影视媒体在对文学艺术消解的同时,却也再造了文学艺术的影响力。而全球化下的信息互动和科技发展又为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外部世界的数字化、体制化、模式化并不能束缚传播主体的精神飞翔。

重要的是,中国作家在创作上必须廓清意识形态上的积弊,让灵魂从肉体中解放出来。因为灵魂是躯体自身的结构和功能,是活着的人类躯体的“形式”,灵魂的理想状态是脱离躯体而存在^[3]。廓清意识形态上的积弊就是让自身处于精神上的自由状态。如果没有起码的警醒,小说就很有可能在已有的积弊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积弊,成为积弊的同谋,并遮蔽灵魂。

不可否认的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上有这种“警醒意识”和不断地变化自己的写作风格以接近或触及灵魂深度的作家并不少,如韩少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爸爸爸》《女女女》到90年代的《马桥词典》就是一个深刻的转变,丙崽、幺姑和鸡头寨的愚昧、荒诞、古怪成了马桥人祖先“罗人”血风腥雨文明变迁的残酷背影,抽空的灵魂在远古黝黑的土地上找到了一方栖息之地。类似的转变从残雪《山上的小屋》到最近《天堂里的蓝光》也得到了印证,后者让人感觉到了皮肤的热度与灵魂的呼吸。而方方从《风景》到《暗示》、王安忆从“三恋”(即《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到《富萍》,莫言从《红高粱》到《檀香刑》以及余华从《活着》到《灵魂饭》,等等,都可以看做是作家在对“灵魂的颤动”的审美追求上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这种努力在“新生代”作家中更成为难能可贵的自觉行动,他们视野的开阔、表现手法的丰富多样和对人类终极关怀所投入的精力,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奔向现代化征途上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活力。例如,王彪在《致命的模仿》中展示人的行为跨越时空那种惊人的相似性,跟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而在《身体里的声音》里,主人公傻瓜因

病死了,突然被雷电击活,而且一下子长高了,脑袋也开窍了。这是神话寓言。但作者只让这种“开窍”闪电一下就迅即消失,傻瓜又退回到从前的愚昧。作者从个体的经验出发,着眼的却是全球的视界:傻瓜的清醒实际上并不清醒,并且所有的人在那个特定时期都不清醒,正因为此,人类才会发生一个又一个悲剧。

“新生代”另一名作家罗望子《旋转木马》则用“拟童话”的方式表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经验:旋转木马,它既不是人又不是动物,但它有着人的符号和动物的形态,两者的藕合处恰恰是传播主体的灵魂所在。作者把有生命的思想注入到无生命的物体上,以此来关注整个社会。在另一篇小说《漫步月球的马拉松选手》里,罗望子一方面推翻现实性,一方面又重建现实性,其主题与《旋转木马》相同,是对抗与妥协,更是出逃和失败。“出逃”是出于对现实挤压的无法承受;“失败”是出于这种逃亡的非现实性所导致的结果。它们都以一种隐喻的寓言方式告诉人们:世界浩荡,夜色茫茫,迷茫中的人类,无处可逃。

但“新生代”的另一主将东西接受了逃亡的事实,不过他将逃亡的终点定在了母亲的伤口上:《原始坑洞》暗指的就是母亲的子宫,儿子杀人后,在坑洞里躲了九个月——象征母亲怀胎九个月。而儿子先是头发脱落,后是牙齿疏松,最终退回到婴儿状态。儿子最后被一个类似于母亲的声音召唤出来,死于仇人之手。母亲的伤口使人类的灵魂感到疼痛。这种疼痛在他的《草绳皮带的倒影》中变成了一种宿命和无奈:人类的一切活动似乎最终都是为自己制造绞索。小说中的草绳、皮带和井,都是一个圆圈,就像故事回到故事本身一样,暗示一辈子都在搓草绳的吴妈最终用绳子吊死自己的可悲宿命。而东西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的视界更为广阔:牛红梅一次次流产隐喻着惨遭破坏的地球,资源被一点一点地掏空,并被开采一光,剩下的只有一张躯壳。她的肉体被掏空的同时,情感也被洗劫一空。

在消费主义社会里,情感的掏空是特殊情境下个人(如牛红梅)得以生存的证明。这是一种荒诞。行者在小说《寓言》里,将这种荒诞聚焦放大,照出了人类自身的辛酸和尴尬:河并不宽,也不深。河对岸有一个漂亮女人。但是小说中那个要过河的小伙子

就是过不去,要过去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即先跟一个丑女人睡一觉。这是残酷的生存境遇;要想追求美丽,必须先与丑陋为伴;而一旦与丑陋做伴,你的情感必须掏空(麻木);即便最终过了河,你也会产生心理阻隔,以至于丧失享受美丽的能力。

如果说,王彪、东西和行者在对“灵魂的找寻”和表现上着眼于时空的变幻、隐喻的切割和对人类自身的质疑与审视的话,那么,陈家桥、曾维浩等人则更多的关注生命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与欲望的搏斗和灵与肉的厮杀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比方,陈家桥在《我的意思》里,写“我”和高红为了向张跃借钱而处于一种紧张的心理较量之中,结果置门外张跃的儿子落水的呼救声而不闻,致使一个幼小的生命惨遭夭折。小说揭露出一种残酷的人生:将某种需要(欲望)置于生命之上,现实的利益淹没了生命力的呼喊。文本最后的温情和悲悯却是:张跃在儿子死后将悲痛压在内心,平静地把钱分别借给了两个为了生存而在他面前进行心理较量间接导致他儿子死亡的人。这个平凡的细节包含着血、包含着泪,也包含着伤和痛:张跃的行为令作者颤动,令文本的主人公颤动,也令读者颤动——这就是“灵魂的颤动”。

中国新时期文学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或缺陷,但在第三世界文学疆域里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景,并夯实了与第一世界文学对话的基础。当然这种“风景”或“基础”还有待进一步的扩展与深入;同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创作主体还必须拥有守住寂寞和忍受牺牲的人格品质。因为中国文学(大而言之文化和文论)在实施全球化战略时,不可能一下子站到中心,也不可能不失去一些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征,但这种失去是为了更多的得到。这种方式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无奈选择,更是为了对中心的消解并重构新的中心及其影响中心之策略^[4]。全球化浪潮打压了文学,但也使文学更好地抖落一些外在的灰尖和喧闹,回归自身,从而在生产场域里,创作主体可以更好地实践,反复打磨,找到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

可喜的是,中国文学界内部在全球化语境的挤压下一直努力地抗争着,在民族、国家、旗帜和个人、家庭和情感的母题下,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出路。比方,几年前兴起、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文体革命”

就是一个显著例子:不少作家和文学刊物把文学从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三分法”合拢起来并且拓宽,即把小说、散文、诗、相声、日记、法律文件等多种文体融为一体。例如,韩少功就喜欢把非小说元素引入小说,搞一点嫁接和杂交,使形式更接近古代杂文学的样式^[5],显示小说在影视媒体包围中“求变求新”的锐气和生气。

又如最近5年来文学期刊出现的一些新景观:《作家》开辟“泛文学”专栏,表明了跨越现成文体分类而尝试多体融合的决心;《青年文学》主张打破文体界限,倡导把小说叙事、散文闲说、诗歌抒情及报告文学纪实等汇为一体的“模糊文体”;《山花》和《莽原》等为“新文体”实验开辟窗口,还有《花城》《钟山》等刊物为“跨文体”积极造势^[6],等等。虽然这种实践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行为本身的努力已经显出其应有的价值。它表明,中国新时期作家在追求“灵魂的颤动”和世界文学对话的过程中,不仅将自己拉入到以全球优秀文化为价值水准的普遍性视野的范畴内,而且始终专注于自身独特文化个性的创造和张扬。

换言之,中国作家在输入全球普遍性视野的同时,竭力从事本土性和区域性的建构,既思索“世界文学”可能共有的审美价值尺度,又着力发掘和创造处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与文化个性——这其实是一个更为博大的“民族寓言”,它远远超出了杰姆逊定义的符号指归,是由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母土的具体实际决定的:即中国作家的“寓言情结”像一根韧性十足的“主轴”贯穿着新时期文学的过去,也联结着中国文学的将来。因为,无论这个寓言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经济改革的深入和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发展而使它裂变或分解成种种不同性质的寓言,如成长寓言、道德寓言、政治寓言、文化寓言、伦理寓言、民间寓言、幻象寓言以及“复合寓言”或“超寓言”的审美走势,等等,从本质上说,都没有脱离“民族寓言”的精神磁场。这是中国文学独有的特色,是民族化的,又是世界性的。中国作家在追赶第一世界文化的现代化征途中,创作群体的集体奋斗并不是茫然的,没有目的性的,而是有着自己清晰的“界限”,可这个“界限”并不是对创作的制约,相反,它是作家的自觉追求,它的外延是“无涯际的”。在变化无常的全球化语境下,握住了

这个“寓言”，就像握住了放飞空中的风筝的拉线，无论飞得多高多远，“中国”二字都会深深地刻在民族的血肉和“灵魂”上。

而这，正是希望的所在。

参考文献：

[1] 希利斯·米勒. 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J]. 当代外国文

学, 1998, (1): 63-68.

[2] 王晓明. 铁舞. 向二十一世纪文学期望什么[J]. 上海文学, 1995, (5): 74-81.

[3] 罗望子. 暧昧[J]. 花城, 1999, (4): 31-32.

[4] 王宁.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J]. 文学评论, 2001, (6): 32.

[5] 韩少功. 生活选择了我[J]. 文学界, 2005(创刊号): 14.

[6] 王一川. 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学[J]. 文学评论, 2001, (6): 27.

Trembling of soul and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allegory

NIE Mao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has manifested its unique character and becomes a part of the cultural mirror imagination from Chinese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with which it takes on multiplayer burthe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moral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oppressed mouldage of exotic discourse, domestic power and ideology. The main creative body presents the aesthetic current, which is both confronting and self-identity, clearing up and restructuring, compromising, bending over and silent counter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people's lives become more formulized, modal and digital. The more capacious people enjoy materially bound, the narrower people's spiritual space is. Literature and art display the significance from matter to spirit, in which the deep indication is spiritual core and man's soul. Chinese writers pay attention to the field of vision from the global universality and do their best to embark the structure form mainland and district, and they consider the aesthetic rule existing possibly from World Literature, dig out and create the unique aesthetic individuality in the field of vision from World Literature. In fact, this becomes a much more profound National Allegory. Therefore, how to make the works be full with the trembling of soul and how to make the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Allegory embed the core of literature, the both missions should naturally become the artistic purpose of every Chinese top-ranking writers to make great efforts and take effective actio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literature in New Era; soul; national allegory;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编辑: 苏慧]